

# 泰戈尔与清华学子的“无问西东”

孙宜学

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处于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都会具有某种盲目性。正是在老诗人因为得不到理解而黯然神伤的时候，是清华的师生以真诚的心理解了老诗人灵魂深处的这种温暖的博大。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如约乘船到上海，徐志摩、瞿菊农、张君勱、郑振铎，以及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和“时事新报”馆，都有代表在汇山码头等候。当双手合十、白发白须的泰戈尔渐渐出现在人们视线内时，岸上一片欢呼声、歌声。人们涌上船，为他戴上花环。一场中印文化交流的盛会正式上演。

## “欢迎派和反对派都误解了泰戈尔”

泰戈尔始料不及的是，迎接他的不但有鲜花，也有尖利刺人的荆棘。就在一派崇拜赞扬声中，泰戈尔也受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异常尖锐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把泰戈尔提倡东方文明、反对西方文明看作是站在崇古复古的立场上反对现代化，是美化封建秩序和封建意识，是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是以抽象的人性论腐蚀人们的斗志。中国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是团结起来，积极参加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而泰戈尔这时在中国到处宣传以爱对抗暴力，大谈精神文明、博爱主义，似乎是在消磨中国人的革命意志。实际上，泰戈尔始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他也不是一味反对西方物质文明，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泰戈尔恰恰是因为坚持拒绝抑制科学文明而长期得不到自己同胞的原谅的。

早在泰戈尔访华的四年前，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问他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有什么拯救方法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我只有一句话：快学科学！”他一直在主张东方人学习西方科学来摆脱被压迫的地位。在中国他也一再强调他所反对的只是把人降为机器的奴隶，反对滥用科学，反对把科学凌驾于一切之上，也就是说，他反对的是畸形的物质文明，同样，他也反对畸形的精神文明，而不是反对物质或精神本身，“从迷幻中醒过来，破除精神物质的畸形，而各还他的本来地位”（泰戈尔：《东方文明的危机——在上海各团

体欢迎会上的讲话》，1924年4月18日）。遗憾的是，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处于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



◀泰戈尔在清华

▶泰戈尔与辜鸿铭  
（《小说月报》1924年  
第15卷6号）



体欢迎会上的讲话》，1924年4月18日）。

遗憾的是，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处于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

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都会具有某种盲目性，而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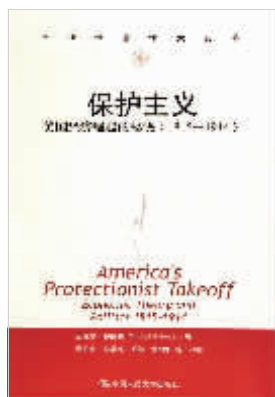
他们的思想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所以，中国思想文化界虽然出过“罗素月刊”、“杜威五大讲演”、“杜里舒讲演录”，忙得不亦

（下转14版）➔

◀（上接12版）

的关注。这也会产生“未觉之痛”。比如说，很少再去思考如下问题：自由贸易是否会将中国锁定于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使中国在国际经济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以至于在国际经济格局中一直位居外围？中国应该怎样构建对外经济战略，才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国家竞争力提升？

有鉴于此（但不限于此），最近几年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通过种种努力，尽量去除西方经济思想传播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成分。比如，对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在崛起时期采用的经济政策等加



以挖掘和整理，同时译述外国学者与此有关的优秀著作。单就翻译的作品而言，就包括了[美]迈克尔·赫德森的《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



（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等等。这些工作是对过去一段时期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失当的选择性传播做出纠正的有益努力。其主要目的是还原历史真相，尽可能避免前面提及的“未觉之痛”。遗憾的是，这样的工作开展得还不够，产生的影响还没有达到预期。

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并不是想说从西方经济思想库中能够找到某种或某些理论，只要做适当的时空挪移，就可直接用之于确立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战略手段——如此重要的工作，只有靠中国人自己去完成；而是与之相反，即中国人在做

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一方面，可以从西方经济思想中汲取有用的成分，另一方面，不要对西方经济思想做不当的选择性传播和吸收，以至于偏离了真实的需要。总之，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曾经说过的话，即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对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吸收，也应作如是观。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教授，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重商主义传统与新形态研究[17BJL021]”资助）